

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關於 地理科學諸問題的討論

陳 原

1950年3月31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的“文化與生活”報上發表專文，對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的領導思想及實際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自此以後，直到今天，蘇聯地理學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問題，並適當地批判了若干錯誤傾向，解決了若干問題，其經過請參看筆者在“學習”五卷二期的報導和在“新建設”五卷一期的論文；這裏專就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舉行的討論（學術會議）加以報導，係根據維扎舍娃的專文（見蘇聯科學院“通報”1951年第六期）、維扎舍娃及柏列奧伯拉任斯基的報導（見“哲學問題”1951年第三期）、格里哥黎耶夫本人的檢討（見“哲學問題”1951年第一期）和地理研究所集刊第一期（1951年）編寫而成的。因為紀錄原文尚未發表，因此文中所引的話可能有出入。

一 丹尼洛夫副所長發言

在討論會中，地理研究所副所長丹尼洛夫首先發言。

他說：蘇聯在實現着偉大無比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在進行着大規模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這給蘇維埃地理學家帶來了巨大的任務，給地理科學的發展打開了寬闊的大路。然而地理科學理論問題的探究，却落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要求之後。在許多場合，地理的調查研究工作完全脫離實際，地理學家中間也沒有好好的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直到不久以前，蘇聯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大學地理學系、蘇聯地理學會（尤其是莫斯科分會）差不多都無原則地禮讚“權威”——格里哥黎耶夫院士和貝爾格院士，而沒有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武器，發現不出這些權威的理論中含有不少錯誤。

比方說——他繼續指出——格里哥黎耶夫院士曾倡導所謂“統一地理過程”是地理科學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和馬克思主義學說毫無相同之點的。他在這個問題上主要的錯誤是：把自然界發展法則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法則混而為一了。儘管格里哥黎耶夫院士本人已經承認錯誤，但是他的錯誤學說却仍在地理學界留下廣大的影響。並且格里

哥黎耶夫院士在其他理論問題上也還有若干重大錯誤。

貝爾格院士及其支持者所堅持的錯誤理論，對地理科學的發展也形成一種障礙。他們主張景觀“諧和論”，對地理學採取“分布科學”（與“歷史科學”、“物質科學”相對立）的立場，採取德國赫特納式的科學分類法，顯然都與辯證唯物主義毫無相同之處的。理論上的錯誤往往招致了實踐上的無成果。

在經濟地理學方面（尤其沙烏希金）宣傳所謂“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的“和諧”結合體，強調了區域的觀點，沒有估計全國經濟建設的總任務。這就是所謂“區域派”。區域的經濟特性和生產分布的特殊性，沙烏希金是單獨用地理環境不同來解說的。蘇聯經濟地理是一門新的科學，它研究生產分佈的規律性，研究經濟區在社會主義下發展和形成的規律性。但是以沙烏希金為首的“區域派”却剛剛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這一方面的學說，這一“派”的理論基礎不過是資產階級地理學“工廠企業位置論”、赫特納的形而上學和庸俗的地理決定論。在“蘇聯地理”一系列論文中，關於經濟地理的部分在分析經濟地理現象時採取了客觀主義的立場（如拉夫羅夫、里亞贊且夫等）。

他強調指出：地理科學在今天有很重大的任

務：研究地理環境，其目標在探究出利用和改造地理環境的方法，以便替共產主義建設服務；研究自然地理區和經濟地理區如何劃分；研究生產分布問題和各區經濟專業化問題，利用當地資源問題，合理的內外聯系問題；編寫關於各共和國、各省和各邊區的地理；出版地理學教科書和通俗讀物。

丹尼洛夫號召到會的同志對於地理研究所成員的錯誤觀點，首先進行嚴厲的批評。

二 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發言

接着地理研究所長格里哥黎耶夫院士發言。他除了進行自我批評外，還對一連串地理學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例如關於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之間的關係，關於自然地理學通論與分論之間的聯系、關於氣候、地形及其他因子在地理環境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地理區域劃分法的原理，並指出了蘇維埃地理學家如何發展了俄羅斯唯物主義的地理學家底進步觀點。但是格里哥黎耶夫院士所提出的意見，有幾點受到嚴厲的批評。下面我們僅摘出格里哥黎耶夫院士對若干問題進行自我批評的發言。他說：

大家都知道，地理學包括兩個部分，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自然地理所研究的是作為整體的地理環境（整個地球和各別自然領土），其構成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自然地理的若干部門（如地形學、氣象學、水文學、土壤地理學、生物地理學）研究的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的地理環境的個別構成部分。經濟地理所研究的則是國民經濟、生產分布的規律性，並由此而研究各區經濟形成與發展的規律性。經濟地理的若干部門（如人口地理、工業地理、農業地理、交通地理等），則研究整體的各別構成部分，研究它們分布的規律性，它們在經濟形成和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地理學包括兩羣不同性質的科學：一羣屬於自然科學部門，研究自然界物體與現象及其發展的法則；另外一羣屬於社會經濟科學部門，研究社會現象及社會經濟法則。資產階級地理學往往認為社會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界規律性所決定的。這一點是反科學的論調。資產階級地理學往往把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歸咎於自然界法則。比方說，殖民地國家的經濟落後，是帝國主義獨佔資本進行掠奪的經濟政策的結果，但是美國地理學家（例如赫丁頓）却竭

力歸咎於這些國家氣候條件不良。地理環境對於社會是有影響的，但它不是決定的影響。斯大林說：“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的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展。但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人類的經濟活動也能改造自然。蘇聯的目前情況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認為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絕然無關，這是錯誤的；同樣，把這兩門科學統一而為一門，也是錯誤的。我在1943年至1946年倡導的統一地理過程，因此是完全不對的。

關於另一點重大錯誤（即認為自然地理研究的對象是“自然地理過程”），格里哥黎耶夫院士因為以前已經檢討，會上沒有進行深入的自我批評。他只舉出杜庫查耶夫的正確觀點，和貝爾格院士關於景觀論的錯誤；之後，他就正面轉入論題。他說：要研究總的自然地理法則，就必須研究個別自然區以及整個自然界的地表。自然地理既然研究地表，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研究地殼（陸界）、水界和氣界、有機物和土壤的相互關係。他提出：自然地理就是研究作為社會物質生活所必須和經常的條件的地理環境（地球表殼）構成及發展規律性的科學。他說：我以前了解所謂“自然地理過程”處在地理環境之上，成為自然地理學研究的對象，是錯誤的。

三 關於自然地理諸問題

通訊院士蓋拉西莫夫發言，首先指出斯米爾諾夫的論文，儘管具有若干不正確的說法，仍舊不失為一篇有積極意義的文章，因為它表明了目前蘇聯地理科學的狀況。在這篇論文裏，作者正確地規定了蘇維埃地理學家的任務，必須跟反動的資產階級地理學進行鬥爭，反對所謂“景觀派”和格里哥黎耶夫觀點的學院性質。但是斯米爾諾夫完全否認杜庫查耶夫的思想對院士貝爾格的影響，這一點是不公正的。作為杜庫查耶夫關於自然地區（Зон Природы）的學說底基礎的，就是自然現象相互關聯這種觀念；這種觀念毫無疑問對許多俄羅斯地理學家的著作是有很大影響的，它使這些著作與各國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的著作迥然不同，因為那些著作是採取了形而上學的立場的。所謂“景觀派”是在實際材料集積的階段出現的，這是地理學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因此，俄國和

蘇聯“景觀派”地理學者(貝爾格在內)有它積極的意義,但是景觀派基本上不能超出關於若干規律性的分析和說明的水平,而這一派的首腦貝爾格又將齊梭夫(Чижов)和赫特納的空間科學觀念貫入地理學思想中,認為地理學的任務,只限於研究空間的規律性。在最近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證明,這種觀念只能妨礙地理科學的正常發展,因為赫特納的思想被資產階級地理學家廣泛利用,來遂行其反動的政治目標了。景觀派方法論的缺陷,使它不能超過敘述的水平,因而它不能往前看,不能規定未來的任務,不能給地理科學的發展定出個綱領來。

斯米爾諾夫在批評蘇維埃地理學家時,說他們是所謂因子論的擁護者這一點也是不公平的。否定個別因子或其複合體在地理環境形成和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顯然這是不真實的。很明白:在分析自然現象時,決不能停留在僅僅說明個別外在因子或其複合體的作用。我們的任務是要重大得多:必須研究外在因子在地理環境的動力學中和發展中的作用,必須把握外在因子(例如太陽幅射能)轉化為地理環境動力學內在因子的過程,轉化為地理環境發展的推動力的過程。這方面發展得很不够,是目前理論地理學中的基本缺點,在這當中也包括了格里哥黎耶夫的研究著作在內。

格里哥黎耶夫院士著作中的許多嚴重錯誤,大家已經指出過了,儘管如此,他却曾正確地提出了蘇維埃地理學界若干重要任務,並且提出了解決辦法。首要的一點就是把地球物理學和地球化學的因素,導入自然地理學中;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研究地理現象,就可以從靜力學的觀點轉移到動力學的觀點。毫無疑問,地理現象的動力學基礎,就是幅射能與大氣濕度的轉化。因此,從這一觀點來比較研究各個不同地理區,顯然是自然地理的重要課題;這樣的研究是認識自然界過程的道路上必要的一步,其目的就是能夠積極改造它。

然而這不過是第一步。這種研究的基本任務就在於研究地理環境中能量與物質各種各式的轉化底具體形態。祇有在這一基礎上,地理環境及其發展的動力學的真正規律性,方能夠揭露出來。然而格里哥黎耶夫不考慮這一點,只對本身的工作加以過高的評價。因此,在他的著作裏面儘管老是提到什麼地理環境發展規律性的問題,其實他却

沒有研究由一種質到另外一種質的轉變過程。如果分析一下格里哥黎耶夫著作中的所謂發展,那不過是一時的動力學上的改變,研究這些臨時的改變,那是必需的,但是不能把一時的改變等同於發展過程。格里哥黎耶夫的錯誤就在這裏。

蓋拉西莫夫的發言得到維里卡諾夫、多斯卡支和杜米特拉希柯的支持。通訊院士維里卡諾夫主要批評了格里哥黎耶夫的所謂“集中性”法則,指出其錯誤的根源在於把種種不同的自然地理過程統一而為一種統一的自然地理過程。但在他的發言中,也有錯誤,即把哲學上的發展概念與自然界的“過程”概念作了錯誤的比較,受到批評。多斯卡支發言指出:斯米爾諾夫強調,地理環境必須當作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來加以研究,這是正確的;他又指出格里哥黎耶夫的著作對歷史觀點不够重視。當前的地理環境動力固然對實踐起很大的作用,然而還要明白因歷史發展過程而引起的一連串特殊性。杜米特拉希柯同意格里哥黎耶夫關於熱力與水份在地理環境發展中這一結論的重要性。

關於自然地理區的劃分法的問題,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發言的有塞里瓦諾夫、阿爾曼德、多斯卡支、凱西、梭波列夫、杜米特拉希柯等,提出了一連串重要的論點。

塞里瓦諾夫說:關於自然地理區的劃分法的任務,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大部地理學家(景觀派)認為自然地理區之所以劃分,其目的是為了便於記敘。實際上景觀區域也是根據外在的形態特徵來分的。結論是自然地理區的劃分法,不能建立在景觀理論的基礎上。自然地理區的劃分法是地理環境類型的分類法,即從實踐的角度來分析綜合其各種要素的一種方法。

凱西的發言包括兩個部分:首先,他指出,自然地理的基本任務在於研究作為社會發展與人類生活(活動)的經常而必需的條件之一的地理環境,其目的則在於改造自然和改造經濟。在這一點上,格里哥黎耶夫認為地理學的對象是在於一切地理環境發展過程,這是不對的,至於認為景觀就是地理考察的唯一對象,也是不對的。很明白,研究地理環境整體的發展,以及考察主要的土地類型,都是必要的。其次,他指出:由此可見,按照經濟上統一但自然上不同的土地來研究地理環境,

和按照自然上統一的土地來研究，都是必要的。必須理解（尤其是“景觀派”的理論家們必須理解）：研究同一性質類型的土地，本身並不是目的，而不過作為進一步工作（解決經濟利用的課題）的一種工具。

四 關於經濟地理學諸問題

接着展開關於經濟地理學諸問題的熱烈討論。在許多發言中，阿藍皮耶夫的發言對這些問題發揮得最透澈。

阿藍皮耶夫首先針對到會發言者的情況，指出若干人發言對斯米爾諾夫的論文估價得很不正確。有的人說這篇論文簡直是把蘇維埃地理學家諸謬畫化了，又說這篇論文否定了蘇聯地理學的一切成就。這就是抵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態度，就是拒絕解決斯米爾諾夫論文所提出的許多問題的態度。否定蘇聯經濟地理學和自然地理學的一切成就是不可能的。蘇聯地理學中間，常會受資產階級地理學的影響。必須認定：廣泛地展開關於地理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就是為着發展地理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基礎而鬥爭，就是為着對一部分蘇聯地理學家的資產階級思想殘餘進行鬥爭。指出這些或那些地理學家的錯誤，並沒有污辱了地理科學。正相反，這會幫助地理科學進一步的發展。

接着，阿藍皮耶夫批評了景觀派的主要錯誤。他說，在地理科學戰線上，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全面執行聯共（布）黨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決定。景觀派地理學家竭力要使研究工作沿着景觀歷史方面進行，而不那麼着重地研究實際存在着的地理環境。和這一點相關的是，在人類所征服的地區裏，研究地理環境便僅限於研究所謂“自然景觀”或“改造景觀”（“文化景觀”）。所謂“文化景觀”這個術語是不正確的，因為這個名詞的涵義包括着兩種互相敵對的景觀，一種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殘酷破壞地理環境所產生的景觀，另一種是社會主義社會改造自然所發展而成的景觀。至於經濟地理學家的錯誤，不僅為斯米爾諾夫指出的景觀論錯誤，而且在於所謂“統一地理”的錯誤。若干地理學家（例如沙烏希金教授）直到現在還在宣傳“統一地理”這種有害理論，即把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混成一種科學，由是等於把自然發展規律

和社會發展規律混淆了。必須對這種錯誤進行堅決鬥爭。

其次，阿藍皮耶夫批評了區域派的主要錯誤。他指出：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和把各國各區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加以分別研究，都是必需的。但是若干“區域派”地理學家却重複了資產階級地理學家的錯誤，事實上限於在一定地區的範疇內來研究該區的自然因素與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企圖離開整個國家政治生活和經濟分布的發展的總的規律性，來說明各區的特殊性。強調地方聯系，忽視總的規律性，其結果使研究細節時失去政治經濟意義，變成一種地理學上的阿克美主義（譯註：акмеизм，本世紀一十年代俄國文學上反對重視內容的一種反民主流派）。經濟區是實際上存在的，它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在經濟區的具體材料上，我們不僅要研究地方特殊性，而且要研究總的法則和規律性的表現，注意新現象和新過程，考察它們並做出結論，來加強共產主義建設的實踐，加強對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的鬥爭。

用景觀觀點來對待經濟地理現象，等於把經濟地理降到感性認識的水平。

柯洛蒂耶夫斯基和奧魯德等人也發言批評區域派的錯誤。

柯洛蒂耶夫斯基說：斯米爾諾夫批評蘇聯經濟地理學方法論的錯誤是正確的，這錯誤大部分有着客觀主義傾向，脫離了社會實踐的需要。他說：在列寧和斯大林著作中，蘇維埃經濟地理的一切方法論問題，都可以找到答案，用不着創造什麼學派，如巴朗斯基及其門徒們把自己稱做“區域派”的始祖的。他說：大部分地理學家認為經濟區的形成過程，是一種社會歷史過程，另外一些地理學家却認為那是自然界與社會相互作用的結果，顯然後者是從統一地理學的觀點出發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可以作出錯誤的結論說，經濟區是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人類改造了某一部分土地的自然界造成的。這顯然不對。

少數發言人（如達哈耶夫）為區域派辯護，認為這本來就是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基礎。

五 結語

經過了討論，大家已同意下面的幾點結論：

一、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不能混合而成

“統一地理學”，因為自然地理學屬於研究自然發展規律性的科學，而經濟地理學則屬於研究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科學；

二、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地理環境。

三、研究地理環境發展的各別規律性和總的規律性，這其間的關聯已經確定了；地理學總論和分論之間有着不斷關聯，這一點也確定了。

四、研究地理環境中的現代過程，以實驗方法研究地理；也確定了。

蘇聯地理學對這許多問題的解決，是在原則上跟資產階級地理學解決方法不同的。資產階級

地理學的目標是竭力把自然發展的規律應用於社會現象上，給美英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壓迫和侵略辯護，他們強調地理學的對象只是研究個別地區，而不是研究整體，他們用客觀主義的態度來觀察自然界，並且僅僅考察空間(分布上)的關聯，拒絕研究作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地理環境的發展。

經過討論，還有若干問題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例如關於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區劃分法，關於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之間的相互關係，關於地理環境發展的推動力等。這些還待進一步的研究、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才能完全解決。

(1951年12月)

我們的控訴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

日本歷史學研究會，自去年舉行了一次大會以來，又有一年了；在這一年間我們受到極大的衝擊。1950年6月自朝鮮戰爭發生以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威脅；世界大戰的危機愈加深刻，對於我們日本民族的和平也直接面臨着重大的危機，不安的戰爭空氣籠罩着日本人的生活。最近已進行了單獨的對日和約，使這個不安狀態更具體化了。日本民族的命運，處此嚴重的局勢下，已走向沒落之途，在這樣嚴重的歷史時期之中，我們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總會，為討論今後的工作方針，曾舉行了會議，特以鄭重地向日本全國各種學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公佈了我們的控訴：

目前如大家所知道的，日本學術會議，鑑於我們的生活已陷入於破滅的絕境，曾發表過一個聲明。許多歷史學家們，由於薪給的微薄、物價的飛漲、徵稅的奇重，非但不能購買一冊研究書籍，為了生計，尚得出售自己心愛的藏書，找尋兼職，甚至依靠賣稿過活。可是最近出版業甚受打擊，已危機急迫，我們收入的來源也將陷於斷絕。相反的，那些威脅着人類生活的軍事部門的研究費用，却毫不吝惜地大量優付，對於真正的為了和平建設而研究的青年科學工作者或各地區的研究工作者，絲毫不給以幫助。在這樣的困難生活中，如何能期望有優秀的研究成績呢？所有的研究機關、學校，均陷於預算的不夠，財政的困難，達於極點，因此大部研究所都不得已而次第關門了。與日本民族的文化遺產極有關係，而存有寶貴史料之法隆寺、金閣寺也先後毀滅，還有大批的文物被盜走而偷運到海外去了。倒行逆施地即不許我們歷史學家、科學工作者與全世界學會自由地交流學術、交換資料，僅限制我們向一部分國家取得價格昂貴的書物。這不僅是科學研究以及研究工作者的危機，對於歷史學的教育也集中地表現着這種危機。沒有得到財政幫助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就是教員的被解聘，每個小學、中學、大學增加勞動強度，教師們為了忠實地執行自己的義務，忙得非要損害了自己的身體，是不會罷休的。最近更有些學校被迫完全使學生們不再學習日本祖國的歷史，而採用了一些驚奇的課程。這樣下去可使日本學生逐漸地喪失其民族的自覺和自尊心，乃至所有日本的人民被消蝕其民族自覺和愛國心，原來日本的歷史學家，以及歷史學恐無存在的餘地了。以上就是我們歷史學工作者所處的現狀；今天我們一面要支持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類的締結五大國和平公約的簽名運動，同時要反對日本再武裝，反對單獨的和約運動，並普及和深入這個運動。

我們在1951年的年會中，已將此問題經過鄭重地討論，而得到結果，全體會員已確認以上的運動是極必要的。

於是面臨祖國的危機與學術的荒廢的嚴重關頭，我們向愛護和平和自由的日本全國各學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結合我們的良心來提出控訴！

(甄譯自日本“歷史學月報”第9號1951年5月18日)